

中国智库建设现状、问题及建议

王辉耀 苗绿

全球化智库 (CCG) 北京 100004

摘要 智库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在历经萌芽、起步、发展期,在政策需求与制度利好推动下,中国智库进入史上最好机遇期。智库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协商民主,对中国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纵横两个维度,将纵向梳理中国智库发展阶段与横向对比国际智库发展经验相结合,对中国智库发展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国际影响力欠缺、思想创新力短板以及智库“跟风”等问题进行了一一剖析,并建议政府、社会、智库多方合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高端智库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智库; 协商民主; 影响力; 创新; 传播; 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G35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Chinese Think Tanks: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WANG Huiyao MIAO Lu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Beijing 100004,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demand of Chinese society. Driven by the policy demands and the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 Chinese think tanks have entered the best period of opportunity in history, after the germination, starting and development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hich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of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s, such 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adequat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lack of originality of conception and bandwagon, and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ink tanks should explore a path jointly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in China.

Keywords: Think Tan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fluence; innovation;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作者简介: 王辉耀, 博士, 教授, 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苗绿, 博士, 全球化智库 (CCG) 秘书长, 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总干事。

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共决策变得更为复杂。政策制定者需要得到可信任、专业又有建设性的建议,他们也需要及时了解现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准备替代解决方案并预测方案的成本及影响,在此背景下,智库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的发展建设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强调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新型智库的建设已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智库历经70年的发展,在一系列顶层设计利好下,在深化改革的政策需求推动下,正进入历史最好机遇期。

但中国智库在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绝不应该忽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只有明确与国际智库的差距,并反思如何改进,才能够更好地完善国内的智库体系建设。对此诸多专家学者也都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议。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西为鉴”,通过中国智库与欧美智库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在哪些方面存在差距,并对照这些差距得出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如薛澜早在1996年便通过借鉴美国智库“专家参与决策”的特点,认为中国智库缺乏投入和建设力度,

提出应尽快地完善我国的思想市场、为我国的软科学机构提供良好环境以及提升思想市场透明度等建言^[1];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中国智库报告项目组”通过对英国多家高级智库的走访,借鉴其运营经验,得出中国在国际视野和前瞻性思维、专业化程度、成果影响力转化、建立规范有序运行管理机制以及激励机制方面有待提升^[2]。另一类则是“立足自身”,将中国当前国情、政策与智库的发展现状相结合,思考当前智库建设落后于政策要求或智库发展受困于制度等问题。如荆林波^[3]将中国智库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在智库评价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智库在公共政策研究、功能发挥、管理水平、国际影响力尚有不足,主要从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话语权的角度建言献策;郑永年等^[4]在《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一书中分类分析了中国的“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独立智库所存在的困境,提出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内部多元主义”、加强智库内部机制建设和智库独立性创新性建设的建议。中国智库与西方智库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尤其是在现实国情、智库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综合来看,中国的智库建设既要符合智库发展的普遍规律,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智库的发展模式,既要“以西为鉴”也要“立足自身”,二者缺一不可。本文保持着这一目标,从横纵两个维度出发,纵向维度通过梳理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与阶段特征,立足本土分析中国智库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横向维度从全球化视野出发,通过选取国外智库建设案例与中国智库进行对比,以借鉴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发展经验,并试图探索出

一条适合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

1 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与阶段特征

中国重视谋士、军师的智囊文化传统由来已

久，不过中国现代智库的出现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年，参事室的成立是中国政府内部智库的最初探索，自此揭开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序幕。近70年来，中国智库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历经萌芽期、起步期、发展期与加速期。（见表1）

表1 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发展阶段	萌芽期	起步期	发展期	加速期
时间段	1949-1977	1977-1991	1992-2010	2012至今
主要特征	体制内政策研究机构形成了中国现代智库的雏形，独立性相对较弱，主要从事对重大政策的解释性研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建立起了多层次的研究机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官方政策研究体系，社会智库开始出现。	官方智库为主导，高校智库相继成立，社会智库取得一定发展。	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等各种类型智库大发展。
代表性智库	参事室（1949年）、中国科学院（1949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5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81年）、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1989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1991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年）、全球化智库（CCG）（2008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09年）	瞭望智库（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3年）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智库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息息相关，最明显的就是每个阶段的关键时间节点都紧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转折点。

从萌芽期到起步期的关键节点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踏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缺少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参考的新阶段，伴随着大量决策及咨询需求的出现，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形成官方政策研究体系。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1981年由国务院成立的包含经济研究中心等在内的4个研究中心，这几大中心在经过两次合并后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社会智库在这个阶段也开始出现比如成立于1989年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

从起步期到发展期的关键节点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随后又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民间智库纷纷成立，比如北京视野咨询研究中心等。随着教育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启动，高校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得到高速发展，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北大国家

发展研究院、复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等纷纷成立，针对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等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开始凸显，中国的日益强大更是引起了某些发达国家的警觉。国内外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迫切需要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的‘智库’和‘智囊团’”。2008年，全球化智库（CCG）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智库的尝试与探索。2009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

从发展期到加速期的关键节点是党的十八大。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智库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下，2012年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智库，中国智库迎来了史上最好发展机遇期。

表2 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建设的政策支持

时间	政策
2012年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2013年	4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把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4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2015年	“两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2017年	2月，《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10月，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 横纵结合看中国智库建设的主要问题

中国智库发展至今，可谓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期，随着中央文件的出台，众多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原有的智库也在迅速扩大发展。但中国智库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发展经验相对欠缺、开放时间晚等原因，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主要体现在智库体系内部多元发展格局尚未建立、国际影响力不足、思想创造力短板和“跟风”现象频出。

2.1 智库体系多元发展格局仍未建立

通过上文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梳理可以发现，中国智库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将民主协商权力逐渐扩散到更大的专家群体、越来越注重贯彻科学民主决策。

从纵向发展的视角看，中国的智库正逐渐增加社会色彩，社会化、民营智库比重逐渐增加，但目前体制内智库仍占压倒性优势，多元发展格局仍未建立。按照软科学机构的统计进行估计，在两千多家智库中，官办占95%，民营占5%^[5]。以官办智库为代表的体制内智库目前是中国智库的主体，承担了大多数的政府课题，是目前主要的政府决策支持机构，比如国研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不可否认，体制内智库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决策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作用。

虽然体制内智库在资金、科研、渠道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官方智库的去行政化与独立性有待加强、

高校智库缺乏现实导向的“曲高和寡”、市场化冲击下的改革难题等。社会智库虽然面临法律地位、生存空间等困境，但社会智库运营的独立性、市场化特质，“接地气”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沟通政商学界的平台优势等，都与体制内智库形成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之势。因此，以统筹兼顾的智库建设思想引导，构建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等多元智库体系发展格局，加快体制内智库的去行政化、市场化改革，为社会智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完善中国思想市场，有助于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

在智库发展格局的横向比较上，本文选取美国智库为比较研究对象，因为美国智库在数量、研究成果质量以及政策影响力上都具有绝对优势，可以说，美国是智库作用发挥最为充分的国家，以至于在美国，智库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本文发现，在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以及两党制的政党制度下，美国智库以民营为主，不同类型的智库在倾向性、研究领域、功能上各不相同，大多智库都通过资金来源多元化确保研究的独立性，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营业收入的45%来自于公司或个人捐赠，29%来自于基金会，7%来自出版物收入，仅4%来自于政府^[6]。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智库体系形成了与美国智库的诸多不同之处，但实现多元发展始终应该是中国完善思想市场的目标。“智库作为专业的公共政策研究者，若欠缺民间性，变为政府传声筒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民意就可能政策制定中被忽视和遗漏。”^[7]科学的决策需要决策者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各个角度考虑决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

的后果^[8]。在中国的思想市场中，具有市场基因的独立社会智库，可以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激发中国政策研究市场活力和创新力，提升中国智库整体水平，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多选择空间，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公平、民主的关键因素。

近几年，在政府高层的重视下，社会智库迎来了发展机遇，大量智库涌现的同时，一些智库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全球化智库（CCG）成为首个进入《2017全球智库报告》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的核心智库榜单等多个国内榜单。不过，整体来看，中国的社会智库仍面临诸如资金、人才、建言献策渠道等诸多现实困难。中国智库体系多元发展格局的建立尚需时日。

2.2 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尚待提升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7全球智库报告》的世界范围内智库综合排名，前100名中中国智库占据7席，相对之前排名也有一定的进步^[9]。但是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化水平尚与国际一流智库有较大差距。习近平就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智库不但缺乏国际话语权，而且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也有所欠缺。

在全球话语权上，中国智库尚无法与查塔姆社、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国际智库相提并论。而掌握话语权，创设新的议题，引导国内外舆论是智库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比如，从对华接触（engagement）到“中美共治”（G2）诸多国际社会所热议的话题都是始于美国智库圈、学术圈的辩论并逐步扩大到决策圈，最终甚至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3]。虽然，当前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显著，在全球治理、“一带一路”等国际关注的问题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国际话语走向的引领、国际话语权提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智库在国际开放度方面也极为不足。根据《2009—2010 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在调查进行的两年里，2000 多家被调查的智库中，有 700 余家智库从未有人员出国考察，超过 700 家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上千家没有开展国际合作项目、没有在国外会议或期刊发表过论文，过半没有外文出版物^[10]。可见，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之路任重道远。

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赖与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同时，一国内部的发展也会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内外影响会更加明显^[4]。因此，智库的研究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化思维，才能提出更为科学、全面的解决方案，这就要求中国智库不能“闭门造车”，而要积极“走出去”，重视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并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实现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交流的转换。

2.3 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力短板

智库要发挥“资政启民”等作用，需要在出思想、出成果方面具备很强的创新能力。第

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外交关系协会就在“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中提出“创建联合国”、“遏制苏联”等建议；二战结束后，布鲁金斯学会立刻提出实施“马歇尔计划”；冷战结束后，美国传统基金会、兰德很快提出“扩大北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观点。《2017 全球智库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然而，中国智库还极少提出过有世界影响力的高含金量的观点，更没有出现像布鲁金斯学会、兰德等具有非常高世界知名度的智库。

中国智库当前的思想创新力短板主要体现在智库多而不精、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以及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等发展趋势的预判不充分等方面。

从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看，研究报告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研究议题小、报告内容散、问题分析浅等方面。一方面各智库没有实现很好的研究领域划分、研究领域相互重叠，以致追逐热点、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的成果多，系统研究、入木三分的分析少，缺乏深度和独特见解，“管用”的政策建议不多。另一方面是数据不充分、不准确或者缺乏代表性，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较严重；缺乏新意和权威性，报告的结论似是而非，可信度不高，不能准确反映真实情况^[6]。

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等发展趋势的研判而言，我国智库也缺乏相应的预判能力。众所周知，美国的兰德智库之所以出名，其中得益于它较早地预测了朝鲜战争，并且为美国国防部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尽管这种说法有争议，但是，兰德智库的名望的确由此存在。^[3]而我国的智库在诸多重大国内外事件的预判上超前研究不够，对未来趋势的引领性成果少，对趋势

性的苗头缺乏敏感性。往往是在政府政策出台后,对政府政策的解读,即政策阐释性成果多。智库由于对自身的定位不够明确,缺乏核心思想产品。

2.4 智库“跟风”现象亟待规范

中国智库在中央提高重视、出台文件之后,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期。发展机遇期的到来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智库的追捧,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无论是企业内研究所还是商业咨询公司都将自己称之为“智库”。

有关机构曾统计,仅2014至2015两年,中国新成立的“智库”就达到约五千家。社会智库发展更有“一哄而上”之势。各类机构都在建立附属于或独立于自身机构的研究部门/机构,而且都被冠名为“智库”,但根据严格的独立性、政策性、公益性的定义,如今的很多智库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智库^[11]。《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已经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对象、宗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界定,应依据《意见》提出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资金来源、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等八项基本标准来辨析当下的各类机构是否属于真正的智库。其中尤其要注意是对党和政府的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非其他研究目的,同时注意,需要是非营利的研究咨询机构。在决定是否有必要建立某智库或者决定某机构是否要智库化转型的最关键标准,是其研究领域和公共政策的相关性及其研究优势^[12]。

“智库热”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我国政

策市场的供给力量,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某些机构以智库为名抢占政策红利,获取社会资源。因此,有关部门的严格规范和引导是保证智库生态体系健康良性发展,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重要保证。

3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的建议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需要政府与智库合力,一方面,政府要为体制内外智库创造平等竞争的机制,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具有思想创新力的各类智库都可以脱颖而出,为国家政策提供更多选择。另一方面,智库自身也要从人才、研究、传播等方面进行持续的创新探索。

3.1 打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形成多元智库发展格局,创造更大决策空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总体目标中所指出的,“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①”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国需要鼓励包括社会智库等在内的多元智库发展,为各类智库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升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权力。政策信息是智库开展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7月9日。

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技术性、社会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信息孤岛仍旧存在,并且严重阻碍了现代政府机构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13]中国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在获取数据方面存在很多障碍,建议加大非涉密信息公开、共享力度,建立公开、透明与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提升包括社会智库在内的各类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权力^[14]。

完善政府购买智库服务制度。“中国的智库呈现出一个竞争的多圈层结构。政党和国家机构设立的智库因对政治制度嵌入性强,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决策者,或者说这些智库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更可能获得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个圈层之外依次是社科院系统、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等与权力中心的‘政治距离’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智库的政策影响力。”^[4]这种相对“固化”的圈层结构下,政府政策需求的“下发”与社会智库产品的“上传”渠道就会受阻。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制度,将社会智库的产品纳入采购范围,规范购买流程,完善考核体系。

宣传公益政策理念,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政策扶贫”。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需要硬实力,更加需要软实力。中国社会目前的捐赠主要集中在助学、救灾等领域,还没有形成对智库等软实力领域的捐赠意识。建议政府在法律和文化方面进行规范和引导,在全社会形成捐助智库的慈善文化,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事业的发展。

健全科学评价机制与管理手段,打造良好的智库生态环境。由智库领域的独立专业研究机构进行相关评审,从指标体系的确定到评审

流程的规范,都做到独立、客观与公正,为打造良好的智库生态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3.2 智库内部的持续创新探索

全球化时代,智库传统的运营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智库只有在研究、人才、传播等方面进行全维度的持续行业创新,才能尽早补齐思想创新力短板,多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并形成国际影响力。

研究。立足自身优势,顺应时代变化,在国内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球问题保持密切关注,深挖国内国际资源,通过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在研究定位、研究方法、研究选题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在严格的学术分析与时事热点分析之间、在研究领域的专一度和广泛性之间等寻找到平衡点。

人才。在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智库需要充分创新人才吸引形式,通过访问学者机制、战略合作机制、实习生机制等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同时,搭建灵活的用人机制,在智库人才的培养、考核和激励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

传播。“创新的思想、扎实的研究只是智库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重要工作是投入大量的精力思考传播战略,并将这个战略付诸实践。”^[15]建议智库在立足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受众,利用“互联网+”打造多元传播渠道,有效扩大智库产品的传播规模与宣传效应。尤其要重视利用国际通用语言进行国际传播,通过英文网站、英文出版物、参与国际会议等方式进行全球传播,打造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现代智库虽然源自西方，但在中国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但这种优势可谓“双刃剑”，如果决策不科学甚至错误，那么产生的后果以及带来的损失可能是灾难性的^[12]。因此，中国政府的科学决策更加需要智库的参与。发挥智库尤其是独立社会智库的作用，搞活政策思想市场，在各项政策制定前以及制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政策市场竞争，推动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为政府提供多元化的决策参考，有效避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

由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智库模式，而应秉持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基于现代智库发展规律，并顺应全球智库发展趋势，政府、社会与智库多方合力，共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高端智库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薛澜. 美国的思想库及对中国的借鉴[J]. 科技导报, 1996, 14(11):18-22.
- [2] 杨亚琴, 李凌. 英国著名智库运行特点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J]. 当代世界, 2017(9):46-49.
- [3] 荆林波. 中国智库发展的问题及策略[J]. 新闻与写作, 2018(6):17-17.
- [4] 郑永年等.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 [5] 王辉耀, 苗绿. 《大国智库》[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6] 周宏春. 中国智库发展现状与促进建议[J]. 中国经济报告, 2017(11):41-49.
- [7] 牧歌. 探索中国智库发展的成功之路——写在“2009首届全球智库峰会”闭幕之际[J]. 今日中国论坛, 2009(8):50-52.
- [8] 苗绿. 思想市场如何“智造升级”[EB/OL]. (2017-05-05)[2018-03-22]. <http://phone.huanqiu.com/r/MV8wXzEwNTk2ODIzXzM3MV8xNDkzOTE1MDQw>
- [9] James G M.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8.
- [10] 苗绿. 探索中国智库国际化路径[EB/OL]. (2008-04-10)[2018-05-11]. http://www.cssn.cn/xspj/zkpi/201804/t20180410_3922561.shtml.
- [11] 王辉耀, 苗绿. 中国社会智库的运营创新探析[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2):55-62.
- [12] 王辉耀, 苗绿. 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13] Hughes V, Jackson P. The influence of technical, soci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on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in a policing environment[J]. Electronic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4, 2(1):65-76.
- [14] 王辉耀. 如何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N]. 学习时报, 2017-05-01(6).
- [15] Brain L C. How Can Think Tanks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in the Media?[EB/OL]. [2018-04-01]. <https://www.atlasnetwork.org/assets/uploads/misc/chapter-21-how-can-think-tanks-win-friends-and-influence-people-in-the-media-crowley.pdf>